



香港電影資料館

懷念 余慕雲先生





坐擁藏書萬卷，樂開懷



《藝林》創刊號(1937年2月)，封面粵劇名伶薛覺先，封底妙齡譚蘭卿。



香港早年電影蹤跡此中尋。二十年代新世界戲院戲樓。

目錄

- 3 前言
- 4 口述歷史訪問：電影研究路上無悔無休
訪問：朱順慈；整理：周荔媿
- 9 香港電影怎可無史
彭志銘
- 10 我知道的余慕雲特色
石琪
- 11 感激與懷念——痛悼先師余慕雲
阮紫瑩
- 12 余慕雲——永不停下的巨人
周荔媿
- 圖片集
- 13 策劃
- 14 歡聚

鳴謝

劉小英、石琪、何翠芬、阮紫瑩、林世清、周荔媿、陳燕遐、陸離、彭志銘、蘇芷瑩、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、銀都機構有限公司

《懷念余慕雲先生》

隨香港電影資料館《通訊》第36期(2006年5月)出版

© 2006 香港電影資料館

版權所有，未經許可不得翻印、節錄或以任何電子、機械工具影印、攝錄或轉載。

香港電影資料館
香港西灣河鯉魚道50號
電話：2739 2139
傳真：2311 5229
網址：www.filmarchive.gov.hk
電郵：hkfa@lcsd.gov.hk

設計：TomSenga Design
印刷：特佳印刷有限公司

前言



2001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，由特首董建華授勳

余慕雲先生，本名余家龍，廣東台山人，1930年11月24日生於上海，未幾舉家遷回廣東。他自小隨在港、穗行醫的父母中港兩邊生活及就學，愛好電影和粵劇。1947年於香港中業學院修讀新聞專業，然後回國參加解放戰爭，在東莞加入粵贛湘邊縱隊打游擊，轉戰大嶺山區一帶。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先後派任東莞太平鎮人民政府及廣州市建設局工作。58年結婚，育有一子一女。五十年代末興起研究中國電影史志趣。64年來港治理肝炎，自此長居香港，後因與在內地的妻子無法相聚，協議離婚。65年受翁靈文〈香港電影豈可無史？〉一文啟發，矢志為香港電影史努力。67年與劉小英結婚，在她的支持下，傾囊搜集香港電影資料，甚至辭掉工作獨力埋頭苦幹；又得情同手足的著名電影宣傳人員林擒帶引，親訪影人前輩。在尚未有人留意香港電影史的重要性的六、七十年代，努力蒐集會隨時間而流失的文物。

1978年首次為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資料及開始撰寫電影文章，82年加入銀都機構，從事資料搜集工作達七年。1995至2001年間出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組策劃，更致力建立研究檔案，出版《香港影片大全》，同時策劃多個專題放映和展覽。1985至2001年間著書十本，包括《香港電影八十年》、《香港電影史話》五卷等。

他的貢獻屢獲肯定，2001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，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「專業精神獎」。他永不言休，多年來先後為香港國際電影節、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，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電影及表演藝術（中國戲曲）顧問；又曾協助團體、個人無數，提供電影資料和意見，包括在2000至2001年間應佛山市文化局的邀請協助籌建黃飛鴻紀念館，及在2002至2003年間協助籌建廣東粵劇博物館。

2006年4月8日余慕雲先生心臟病發，於廣州逝世，享年76歲。他近年陸續把畢生收集得來的珍貴雜誌、特刊、本事、照片等等數以萬計的資料，移交香港電影資料館，裨益各方有志研究者。我們向他致萬二分敬意的同時，會永遠懷念這位率性、魄力過人的電影史研究拓荒者。

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授專業精神獎



2001年自資料館榮休，與馬啟聰合照

口述歷史訪問： 電影研究路上 無悔無休

日期：2001年1月29日
地點：香港電影資料館
訪問：朱順慈
整理：周荔媿

少年時

龍從雲，龍有雲便生 我的本名叫余家龍，余慕雲是學名，唸書時用的。龍從雲，有所謂「雲龍」，龍有雲就生了。「慕雲」這名字是林擒的大哥林世鴻給我改的，我一直用到今天，身份證上也是。

我生於西曆1930年11月24日，原籍廣東台山。我的父母都是醫生，母親在上海執業時，父親還在唸書，這期間我在上海出生。不久，父親畢業了，之後舉家遷回廣東，在廣州住。小時候的家庭環境算是不錯，我的父母都是有名的醫生，忙得不得了，因此沒有多少時間管我們。

很小的時候我已經喜歡看電影、看粵劇，幾歲就喜歡，解釋不了。那時候很有錢，自己掏腰包買票，甚麼戲都看。那個年代很少中國電影，香港的亦不多，主要是看西片。當時的票價很便宜，大概幾毛錢左右。

寄居林家 我姓余，卻在姓林的家庭長大。我的弟弟和阿十，即林世清，是同班同學。當時我當童子軍，要找參考書，我的弟弟告訴我他的同學家裏有很多書，就帶我去林擒家裏。當時沒有影印機，林世鴻，即林世清的大哥很愛書，常動員我們兄弟幫他抄書，慢慢大家就熟絡了。他教我們寫字、詩詞歌賦等，潛移默化之下，我自己也愛上讀書，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就在他那裏打下的。以後就乾脆不回家，在他家裏長大；自十二歲開始在那裏，一直到十八歲，共六年。

我稱林擒為「五哥」，他在家裏排行第五，原名林世忠。初時林擒是搞話劇的，後來認識了導演黃達才，轉入電影界，開始時做宣傳工作，像翁靈文那樣。當時香港只有三幾個片場：「永華片場」、「大觀片場」、「南洋片場」等。因為搞宣傳的關係，林擒常常要去探班、看拍戲、寫宣傳稿，我就跟着他，自小就在片場進出，因此很早就接觸電影拍攝的工作，也就認識了吳楚帆、李鐵、吳回、黃曼梨等電影工作者。

來往港穗 1946、47年，國共內戰，很多著名的文化人如茅盾等南下香港，開辦了三間大學，中業學院是其中一間。那裏分不同的專業，我唸的是新聞專業。我選新聞是因為個性比較接近，自小喜歡寫東西，有點天份。但是我卻從未做過新聞工作，反而八十年代在香港的《中外影畫》做過一陣子編輯，與新聞有關的就只有這份工。

1948年我回大陸工作。第一次結婚在大陸，後來1964年我回港，髮妻未能同來，我也沒法回去，大家當時都很年輕，



童年時與學生弟弟



1958年除夕，與「啟蒙老師」林世鴻（前排左一）、其弟林世清（後排左一）及林氏外甥



1984年與情同手足的五哥林擒（中）、十弟世清

三十多歲，因此協商離婚。我們有一子一女，都在廣州，跟着我的母親，在那裏長大。她後來跟一個師範的同學結婚，我也再婚了。

香港電影 豈可無史？

研究電影「三結合」 我除了電影以外也很喜歡歷史，這也不能解釋。大概在1958、59年左右，我開始研究中國電影史。那時我已經比較成熟，懂得自己做學問。當時我在大陸工作，做的是廣州市建設局的幹部。我開始買很多書，整個房子都是電影書。我研究電影，特別是中國電影史，是從1958年底開始的，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這上面，有了一種精神寄託。

我在1959年開始研究，到1964年回到香港，因為已經研究了五、六年，對中國電影稍為有點認識，知道中國電影包括三個地方：大陸、台灣和香港。中國大陸的電影已經有人研究，並已寫成專著，是程季華主編的《中國電影發展史》（1963）；台灣的電影也有人研究，也寫了書，是呂訴上著的《台灣電影戲劇史》（1961）；可是卻沒有人研究香港的電影歷史。我回來以後覺得不對勁，中國電影三個地方，獨缺香港，中國電影史就不完整了。當時剛好翁靈文先生寫過一篇文章，對我的刺激很大，叫做〈香港電影豈可無史？〉，我覺得很對。基於這個原因，我在1965年立志開始研究香港電影，希望能補回中國電影史這方面的不足。

一開始研究電影，我可以說是「三結合」。一是看電影，這是最重要的；二是訪問，訪問電影工作者；三是看文字資料，所有有關電影的書籍、雜誌和一切文字資料都看。我那時拼命的看戲，可說是很幸運，差不多戰前的電影我都看過，可

惜印象不深。到我立志研究香港電影時，就更加注意看香港電影。通過林擒的關係，不單電影界，粵劇界、報界，全部都熟悉，我跟着他，其他的都不管，專攻電影。

那時我還不懂做訪問，只是找一些前輩傾談，談有關電影的種種。我也開始買書，六十年代很多電影雜誌甚麼的，怎樣也買不完！七十年代開始少了，現在更少。

編製片目 最初的三、四年是沒有甚麼計劃的，總之有戲就看，有人就談，有書就買。經過三、四年後，總算摸索出頭緒來，那方向便是編製「香港影片目錄」。要研究香港電影，首先要知道香港拍了多少電影，拍過甚麼電影，如果連這些都不知道，根本沒法研究！從影片目錄可以知道哪年開始香港有電影，有甚麼電影公司、甚麼導演、甚麼潮流，整個香港電影的發展過程都會很清楚。

那時是1965年，香港電影大概有七千部。我下定決心，設計了一個表，有編號、年份、公司、編導演、公演日期、票房紀錄、附註等資料。當時我已對香港電影有一些了解，知道1896年香港才有電影^[1]，那麼當時香港有甚麼報紙呢？是《華字日報》。它於1895年創刊，較香港電影傳入早一年。於是我到香港大學，順着年份和日期，從《華字日報》逐日逐月逐年抄下有關香港電影的資料，一直抄到1924年。

也是那時候，我知道香港每一個年代都有一、兩份著名的報紙，是所謂的「大報」。當時有《華僑》、《星島》和《工商》三份，以《華僑》最完整，尤其是娛樂消息。它於1925年創辦，《華字日報》的資料不及《華僑》齊備，於是自1925年以後，我就改用《華僑日報》做基礎。

當時，《華僑日報》報社還在荷里活道，我也不認識岑維休（《華僑日報》創辦人）等人，自己大着膽子跑上去，說想找資料。岑維休那時還在生，他說好，年輕人要看給他看，就在編輯部給我一張桌子。他們有一整個房間的舊報紙，半年釘裝成一本。我由1925年第一張開始看，看了半年。為了多點時間看資料，乾脆辭工不幹了，反正老闆是好朋友。我到香港大學和《華僑日報》報館看資料，從二十年代看到七十年代。從七幾年開始，（主要報章）已不是《華僑》而是《東方》；總之我看大報，現在是《東方》、《蘋果》之類。幾十年的報紙一直抄，很有耐性，所有資料都抄下來。

做學問真的要博也要專，不能分心。所以我現在教徒弟阮紫瑩也說，做一件事情就專心做好。要博就是要懂得多，然後才能融匯貫通，容易理解；但研究一個項目則要專，等於我幾十年來研究香港電影一樣，搞目錄就搞目錄，就這樣搞了七年。直的是報紙，橫的呢？我還要校對。當時有二十多間電影發行公司，每間有幾百部電影發行，我去那些公司把所有目錄拿回來校對。此外，還有電影雜誌，也是這樣逐一校對。經過七年時間，我整理出一個「香港影片目錄」，對香港電影有了個概念，知道大概是怎樣。

分期問題 之後進入第二步工作。香港電影大概有八十年歷史，到底該怎樣進一步研究？我又想出一個很正確的方向，就是研究「分期問題」。究竟香港電影八十年，該分多少個時期？

我在1978年第二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時寫了一篇文章，談到香港電影史的分期問題。當時我根據手上的資料，詳細分析各個時期的不同。最初沒有香港人從事電影工作，來拍片的全是外國人，愛迪生時代我叫「啟蒙期」；1913年開始，黎民偉等拍攝了《莊子試妻》（1913/14）、《胭脂》（1925）等片，我稱這時期為「萌芽期」；然後三十年代是「成長期」，再後是「發展期」、「繁榮期」等，共分九個時期。

然後是第三步。最初我的研究是按這樣分期，幾年之後，我才發現不對。香港電影有國語片、粵語片、廈語片、潮語片、紀錄片等等很多種，粵語片與盛時國語片未必興盛，反之

亦然，如果我說這是「興盛期」，到底是指國語片抑或粵語片？這是矛盾的。於是我以年代來分，把香港電影近一百年的歷史分為默片時代、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，如此類推，我認為較以前更準確。

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淵源 我跟香港國際電影節扯上關係，是與林年同先生有關。林先生是第二屆電影節的策劃。當時，他在大會堂高座辦一個電影書籍的展覽，我因為手上有不少香港電影的珍貴書籍，於是毛遂自薦寫信給他，請他來看合用與否。我們談起來，他覺得我這個人不簡單，有句話至今我還有印象，他說：「沒想到香港真的臥虎藏龍，有你這樣的人。」那時候，我已經默默耕耘了十多年，一點不與外界接觸，專心做研究。他說為甚麼我不出來，不把研究發表，參與實際的工作。我覺得這對我的研究沒甚麼好處，不想花很多時間作無謂的應酬。

他向我約稿，我就給第二屆國際電影節寫了一些文章。當時他負責粵語片，我們談粵語片四大公司，他知道有「新聯」、「中聯」、「光藝」、「華僑」等，我說他遺漏了一間很重要的「大觀」，那是更早、影響力更大的公司。他說沒人提過，叫我寫。於是我就寫了一篇關於「大觀聲片有限公司」的文章。他也叫我寫一篇多年來的心得，我就寫了分期問題。

自那時開始，我就跟香港國際電影節合作，由林年同、劉成漢、舒琪、李焯桃、羅卡等策劃，一直下來，沒間斷過。因為我的資料比較多，每辦一個專題，我就給他們做年表、提供照片等；他們每年也約我寫一些專題文章，搞片目和人物小傳等。

香港國際電影節可以說有兩大特色，一是對本土電影作專題回顧，這在國際上有很大的貢獻，值得其他電影節學習。另外一個也很突出的工作，是亞洲電影的回顧。長期以來，我們都有亞洲專題，為伊朗、印尼等亞洲地區的好電影做專題；據我所知，很多國際電影工作者專程來香港看亞洲電影，這是很有的成就的工作。



與子女余永昌、余小曼



妻子全力支持開拓史料荒原，恆恆數十載



與劉小英譜伉儷

工作

太太默默支持 我做過很多工作，主要從事女裝手袋業。我的一位好朋友是老闆，請我去幫他，做了近二十年，一直當廠長。那時挺寫意的，沒人管，因此有很多時間去研究電影。我的太太是在工廠裏認識的，她是手袋廠的起辦師傅，人很聰明能幹，我們日久生情，後來正式結為夫婦。未婚前她已經知道我研究香港電影，認為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，所以婚前婚後她對我的研究工作都很支持。這表現於她的經濟獨立，不須依靠我；另一方面我也一直有工作，可是我把我收入全部投入學術研究方面，她也不會阻礙我，「拖



香港電影資料館平頂那一天



研究電影「三結合」：看電影、訪問、文字資料，是以研究組進行「口述歷史計劃」，同時大量搜集資料。「口述歷史叢書」包括輯錄了（後排左二起）攝影天王何鹿影、製片家童月娟、第一代武打女星「洪媽媽」錢似鶯（洪金寶祖母）和作詞家陳蝶衣的豐碩電影人生。

我後腿」；甚至我沒給家用，她也一樣把我的起居生活照顧周到，讓我無後顧之憂。別人可能會嚙，她不會。我們也沒有小孩，所以這三十年來我才可以全心全意做學術研究。這點我真的要感謝我這位好太太——如果我有一定的成績，她是功不可沒的；如果說我一生中要感謝誰，那要感謝她。

在銀都做資料搜集 我在進香港電影資料館之前曾在銀都機構做事，一做七年，那可說是由程季華介紹的。程是中國電影文化界的領導人之一，也是中國電影史的權威。在這之前，我研究香港電影史大概已有二十年，發表了很多文章，寫了些書，這些都引起程先生的注意。

他於1980年左右來港，知道有余慕雲這人。當時馬逢國先生在鳳凰影業公司宣傳部工作，程先生叫馬逢國請余慕雲去見他。由於大家都研究電影史，志同道合，我們一談便是幾小時，十分投契。他覺得我是一個人材，因此臨走時跟銀都機構的董事長廖一原說：「你們要找這個人進來幫忙。」廖先生於是請劉芳先生找我，問我要甚麼條件。我這個人一生都那麼傻，我說我不願意做全日，否則沒時間做研究，我說只能做半天，而且是做資料搜集整理的工作，他們都答應了。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興趣與職業相符，那是最幸福的。

當時銀都訂購了全東南亞和香港的報紙，我的工作負責剪報，每天把所有報紙看後，分門別類剪存起來，一個星期呈交一次。當時銀都有八位董事，我印八份給他們看，等於說他們不用看報，我替他們看。

此外，還有很多突發的工作。例如《英雄本色》(1986)叫座，他們馬上叫我寫報告，研究它為甚麼那樣叫座；又例如銀都機構的「長風新」(長城、鳳凰、新聯)、中聯共有六百多部影片，他們叫我做一個影片目錄，我也得做。銀都的董事長向來從大陸派來，三數年換一次，我得去幫他認識香港電影等等，我就做這些工作。

香港電影資料館 而有關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成立，最初只有三個人：馬啟濃先生，林覺聲先生，和一位唐先生(唐富雄先

生)，現在說起來已是九年前的事。他們三人都有跟我接觸，特別是林覺聲先生和唐先生，常常到我家裏，大家交換意見。

這幾年來(1995至2001年出任資料館研究組策劃)，我最感安慰和高興的是看見資料館成長壯大。我初進來的時候，資料館還未成形，基本上甚麼都沒有；經過這些年來同事的努力，和各方面的支持，無論在藏品以及其他方面，成就都很令我高興。

資料館的同事也很好。我自十七歲做事至今七十歲，很少見到同事關係這麼融洽，特別是我的助手(周荔婁)很能幹，大家合作得很好。

我在資料館做了不少基本工作，第一是搞《香港影片大全》，第二是每年的三個展覽，一大兩小；我自覺也盡了能力去做，算是滿意吧！我感到我個人的工作，以及與周小姐的合作是越來越有進步，最初我們搞的展覽未必及後來的好，如唐滌生、黃飛鴻、李小龍等影展，都可以說有一點成績。

經過這二十年以上許多人，特別是香港國際電影節、電影資料館等人的努力，我們可以看到默片時代，以至八十年代的電影目錄，但是現有的片目也只是初步，還是不完整的。在香港，默片時代以至三、四十年代的電影資料很少，能找到的不多；我在資料館做《香港影片大全》時已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可是現在我發覺還是有很多遺漏。最近幾年我在廣州中山圖書館特藏部就發現了重要的香港電影資料。

香港電影於戰前的市場主要在兩廣——廣東和廣西。原來當時兩廣的報紙記載了很多香港電影的資料，如《廣州日報》、《市民日報》、《天光報》、《伶星雜誌》等。將來有機會修訂第一至三卷《香港影片大全》時，需要查看這些資料。

談香港電影

電影是甚麼？ 電影的本質基本上是商品，特別是香港電影，這商品有它的思想性、藝術性、娛樂性。所謂「思想性」，是指電影的主題，對人產生的某些影響，有好的有壞的；電影也有它一定的「藝術性」，這表現在編、導、演、攝、剪接等各方面，當中有高低之分；電影的娛樂性更是不容忽視。因為電影是一種商業投資，一種大眾藝術，如果沒有娛樂性，可以說是失敗。如果思想性娛樂性都有，就能雅俗共賞，叫好叫座。

潮滬語片是滄海遺珠 其實，香港電影基本上是拍給華僑看的，主要市場不在香港，是海外華僑，由開始至今都是這樣。全世界的華僑最多是廣東人，當中有兩大類：廣府人和潮州人。潮州人多數聚居星馬泰，所以香港當時拍的潮滬語片很少在港公映。現在我所知的超過三百部潮滬語片亦只是一半而已。潮滬語片與廈滬語片大概到1965年就沒有了，它們加起來起碼超過千部，就是說香港電影究竟共有多少部？無人能知道。如果要真正了解潮、廈滬語片，得到星馬泰、越南、菲律賓、台灣，甚至美國等地，才能找到有關資料。

台語、福建廈門語、潮州語、海南語原來是共通的，它們都是閩語系。海外華僑中福建人很多，香港拍了廈滬語片到海外放，台灣是其中一個主要市場，因為鄉音親切，影片非常受歡迎。那麼，台灣人覺得為甚麼要給香港人賺錢？因此台灣人自己也要拍台語片。台語片的興起可說是香港電影的功勞，這也是我的研究所得。

潮滬語片對海外華僑的影響也很大。好像有一部電影叫《劉明珠》(1965)，在泰國曼谷上映時，全部潮州華僑店舖休業去看，那是如此的哄動！

未曾在港公映的「海外片」 還有幾大類的影片資料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，一是香港出品而沒有在港公映，只發行到海外的影片，如「通用公司」的出品。「通用公司」起碼拍了三百

部，可是這目錄在香港無法找到。類似的公司有很多間，這一類發行海外的影片有多少？無人知道。

此外，無法安排上畫的影片也相當多，數以百計。這需要大家的努力，找專人去整理；所以，我說香港電影的數量超過一萬一千部絕不誇大。

香港電影的優良傳統 從我這三十多年的研究所知，哪些是香港電影的優良傳統，哪些是根深蒂固的毛病、缺點，我都有初步總結。這優良傳統主要表現在思想性方面——戰前它是「愛國主義」，日本侵華激發起我們的抗日反侵略決心，特別一部《最後關頭》(1938)最有代表性，那是所有公司合力義拍的電影，全民參與抗戰。當時沒有一個電影工作者願意與日本人合作，這是香港電影史上很突出的一點。

而貫穿六十年代以前的香港電影的優良傳統，是「重人倫」。人倫是中國固有的傳統道德，無論國語、粵語、潮語，所有好的電影幾乎都是倫理片，像《家家戶戶》(1954)、《中秋月》(1953)等都是。

第三個優良傳統是「導人向善」，這是關文清先生，香港電影的老前輩「關伯」告訴我的。他說當年和趙樹榮、黎民偉等人拍戲，專門拍導人向善的電影，就是電影裏好人有好報，壞人不得善終。六十年代以前的七千部電影中，無論國、粵語片，絕大部份都是導人向善的。

香港電影的弊端 但是不好的一面呢？就是粗製濫造，跟風搶拍。

我認為在香港電影史上，七十年代是一個分水嶺。六十年代以前的電影，主要受中國傳統文化道德影響，七十年代以後則逐漸西化，特別是受西方文化不好的部份影響，如黃色、暴力、無原則的反叛、心理變態、宣揚迷信等等。

我個人認為，香港電影在七十年代以後是逐漸走下坡，可說是倒退，無論產量抑或內容上皆然。很簡單，香港電影以前在世界很受歡迎，特別在東南亞、日本、韓國等地，可是為甚麼1993年以後香港電影突然間失去所有市場？主要的原因是素質不好。以前的香港片很賣座，賺大錢，但1993年以後，片商買一部虧本一部，「蝕到怕」，令他們卻步。

如何復興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是有希望復興的，但不容易。香港人很聰明，香港電影不會死亡，可是要復興，則需要長時期各方面的努力。首先要培養編劇人員。劇本乃一劇之本，只有好劇本才可以拍出色。香港電影的編劇人材太少，編劇的缺乏是香港電影的致命傷，只有大力培養編劇，才能解決問題。

第二，要培養幕前的人材。電影始終是崇拜偶像的，可是現在基本上沒有偶像，好一點的也給荷里活搶去。

研究與寫作

《香港電影史話》等 自1977年與林年同接觸後，我才開始寫文章，之後第一篇文章發表在《明報月刊》，叫《評〈中共電影史概論〉》。當時，一位叫張力濤的朋友寫了這本書，我來評它，這是我的第一篇電影論文。自那以後我開了竅，不斷寫，三十多年來寫了大大小小不少文章，以及十部香港電影書。

我由默片時代開始寫成了書，即《香港電影掌故》(1985)。之後在藝發局(香港藝術發展局)資助下，重寫默片時代，然後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一直寫下去；今天《香港電影史話》出到五十年代，是第四本。^[2]香港電影的內涵實在太豐富，我也未能掌握所有資料，怎能寫史呢？可是我已經七十歲，不寫不成，所以膽敢寫「史話」，將我歷年來搜集的資料整理出來，把認為值得講的人與事紀錄下來，讓將來一些香港電影史家作為參考。

我覺得我寫下超過一百萬字裏面，比較有份量的是《香港電影八十年》(1994)，那是三棟屋博物館，即昔日的區域市政局出版的。書中我對香港八十年來的電影歷史作了概括的描述，還有很多附錄，像「一百個電影工作者」、「得獎影片」等等。

另外較有「江湖地位」的是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其中的〈電影卷〉(1991)，能寫大百科全書的人都要有一定的水平。當時我在銀都機構做事，出版百科全書的人來香港徵稿，找着領導，他們說找余慕雲吧，於是我給他們寫了幾十個條目，包括「香港電影事業」、「台灣電影事業」、各個影片公司、著名演員、導演的介紹等。

我寫了很多文章，作過各方面的專題研究，可惜沒機會結集成論文集。我的文章除了發表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刊以外，還載於《南北極》、《電影雙周刊》、《電影欣賞》等許多刊物。

三項重要工作 我認為研究電影，除了搞影片目錄、歷史之外，還應該研究人物，以人物作為一個基礎，寫人物列傳。我這一生有三項工作希望能夠做到：一是香港影片目錄。自我1995年入香港電影資料館以後，整理香港影片目錄是重點工作之一，出來的就是《香港影片大全》，現在也一直在整理；二是寫以事為主的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；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把香港電影工作者寫成列傳，內裏有人物的照片、簡史和片目。如果我能把這三件事完成，後來的人研究香港電影就方便很多：看目錄有《香港影片大全》，看事有史話，找人有列傳，對後來研究的人一定很有幫助。

可是我現在只在進行兩件事，第三件沒時間做。本來我還有一些想法，譬如寫《香港電影辭典》之類的工具書，這更沒有時間，可是我可以把這想法說出來，希望後人可以做。《香港電影辭典》裏面包羅萬有，人物、事件甚麼都有，一查就能查到。辭典、列傳、目錄、史話這四大工作，是大家的目標。我覺得研究香港電影大有可為，誇張點說還是一個處女地。

研究電影的路

孤寂的路 香港電影的研究工作很有意義，可是非常痛苦。現在還好一點，有香港電影資料館，我也有幸在這裏五年多；可是以前的幾十年是全沒有人支持的，靠自己出錢，看戲、訪問、買甚麼都是自己負擔，可謂付出的多收穫極少。

而且研究工作是非常之枯燥苦悶的。這二十年來我每天平均用十小時來做案頭工作，不悶才怪！當然我有特別興趣則另當別論。我的兒子曾經叫我教他，我也不肯。我一世窮困，又苦悶，學我幹甚麼？我只得一個兒子，他要學我也不教。我覺得研究工作始終是孤獨的，熱鬧反而不行。

可是我沒有想過放棄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一是使命感。我覺得沒有香港電影歷史，中國電影史就不完整，很多前人做下的功勳也沒有人紀錄，這工作非常有意義，而這也是支持我至死不變的原因；第二是特殊興趣，我天生是這樣，沒辦法。

研究香港電影史，非十年以上不為功，十年也只是入門而已；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到老，才能說得上有一點成就。

與阮紫瑩的師徒情 做研究工作很孤獨、很窮、又苦悶，那為甚麼又收徒弟呢？這也是一個機緣。阮紫瑩像我一樣，自十多歲已迷上香港電影。可能她特別注意我，覺得我頗有意



《香港影片大全》(第一卷)
余慕雲策劃, 黃淑嫻編輯



思，因此想學我。大概在八年前，她來找我，說準備學我不做事，錢花光再說，希望我教她怎樣研究香港電影。我覺得孺子可教，尤其在香港這樣的地方，竟然有人這樣傻，不去賺錢，反而拿錢出來做研究！我發現她原來已經傻了十多年，特別對粵語片很熟悉，我想既然她有這樣的心，好吧，就指導她吧！這可說是機緣，也是運。

幾個月後，藝發局給了我一點資助，寫五本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，當中有助手費，正好由她來幫我搜集和整理資料，那時時機剛剛好。我也常常指導她，不但在專業上，也教她做人。經過這幾年的觀察，我基本上滿意，起碼她不會做壞事。

研究態度 研究香港電影，第一要不怕苦，不怕悶，認定其中的意義，還要有極大的興趣，這是先決條件。然後，你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學歷知識，不然不能研究。因為香港電影不是孤立的，我們同時要研究很多東西。香港電影和美國、日本、法國、意大利、台灣、大陸等地的電影都有很密切的關係，對這些地區的歷史文化不認識，是無法理解香港電影的。

同時，研究香港電影有幾樣基本學問一定要懂，如粵劇。因為，香港超過一萬部電影，當中有十份之一，即近千部與粵劇有關，如果不懂粵劇就無法理解這些電影了。香港又有過千部文藝片，改編自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，如果你對文藝作品不認識，也是無法理解的。

此外，做歷史研究的人一定要無愛憎，要客觀、公正和冷靜。做研究的人亦有一個很大的困擾，就是立場問題。為甚麼我的《香港電影史話》要在次文化堂發表？那是因為我跟次文化堂的老闆（彭志銘先生）有一個君子協定：他絕不能改我一個字。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，可是你要先讓我發表，以後你可批判我。我盡量不左不右，只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，我覺得只有在現在的香港才可以比較客觀的談論事情。

我佩服的人不多，石琪是當中的一個。寫影評是他的基本工作之一，他每天都寫，而且他有一定的學識和專業知識，是少數我崇拜的、讚許的人之一。我覺得他的影評比較客觀和中肯，我看過不少影評，很多都是很偏激的。

退而不休 我已經退休兩三次了。六十歲時在銀都機構已經退下來，現在七十歲在資料館也退了，可是我可以說永遠不會退休，至死方休。之後我也一樣繼續工作，我覺得一個人如果沒事做很快會死。這三十年來我做研究既非為名亦非為利，一直在做我覺得有意義、有興趣的工作，我希望可以做到死的一天，這是一種幸福。所謂「閒愁最苦」，有事忙最幸福。但我可以肯定，到我死的時候工作也做不完，只能盡力而為。

【編按】

1. 余慕雲先生認為電影在1896年傳入香港（參見《香港電影史話》《第一卷》1896-1929，次文化堂，1996，頁5-9），另有在1897年傳入香港的說法（參見法蘭賓，〈「電」力與攝「影」的結合——重究香港早期影史日誌〉，香港電影資料館《通訊》，第6期，1998年11月，頁7-10；及周承人、李以莊，《早期香港電影史》1897-1945，三聯，2005，頁10-14）。

2. 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（第五卷）五十年代（下）（1955年-1959年）後於2001年8月出版。

【著作】

《香港電影掌故第一輯 默片時代（1896-1934年）》，廣角鏡，1985。

《香港小姐與香港電影（1946-1988）》，三聯（香港），1989。

《香港電影八十年》，區城市政局，1994。

邱良、余慕雲編著：《昨夜星光》（一）（1940's-1960's），三聯（香港），1995。

邱良、余慕雲編著：《昨夜星光》（二）（1960's-1970's），三聯（香港），1995。

邱良、余慕雲編著：《昨夜星光》（1940's-1970's）（日文版），東京，WISE，1996。

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（第一卷）默片時代（1896年-1929年），次文化堂，1996。

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（第二卷）三十年代（1930年-1939年），次文化堂，1997。

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（第三卷）四十年代（1940年-1949年），次文化堂，1998。

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（第四卷）五十年代（上）（1950年-1954年），次文化堂，2000。

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（第五卷）五十年代（下）（1955年-1959年），次文化堂，2001。

此外，其文章散見歷屆香港國際電影節「香港電影回顧」特刊、《南北極》、《電影雙周刊》、《中外影畫》、《中國電影年鑑》、《中國電影電視名人錄》（1982）、《陳非儂粵劇六十年》（1982）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電影卷》（1991）、《香港電影圖誌1913-1997》（1998）等。

香港電影 怎可無史

彭志銘



(前排左起) 彭志銘、彭素芬、石琪、陸融、阮紫瑩、余慕雲、李子翹、李焯桃
(後排左起) 李文鶴、吳昊、羅卡

遠在香港政府還未有打算為電影設立資料館之前，很久很久之前，坊間早已有個六十歲的小市民，余慕雲先生，花了近三十年的時間，耗盡家財，搜集一切與香港電影有關的刊物。他的志願，是編寫一本《香港電影史》，原因只有一個：香港電影怎可無史。

「沒有《香港電影史》，中國的電影史便不完整。」余慕雲曾這樣說。

1995年，余慕雲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，讓他出版五冊《香港電影史話》(他稱為「五卷」)。其實，余慕雲準備把香港電影一百年的歷史，分成八卷闡述：

第一卷，講的是默片時代，由電影最初傳入香港時的1896年至1929年，那段啟蒙及萌芽期的狀態。

第二卷，是三十年代，從默片與聲片並存，到粵語片和國語片並存的相關記錄。

第三卷，是四十年代，由抗戰期到淪陷到光復，及至四九年，香港電影的一段艱苦歲月。

第四卷，是五十年代，戰後經濟陸續復甦，帶動香港電影蓬勃的勢頭。

第五卷，是六十年代，香港粵語片生產的高峰期。

第六卷，是七十年代，粵語片走下坡，電影市場由國語片代之，及新浪潮的崛起。

第七卷，是八十年代，香港本土電影的黃金時代。

第八卷，是九十年代，香港電影由頂峰滑落，跌至黯淡的大轉變。

余慕雲從1995年動筆，寫至2001年，六年間，完成了五冊《香港電影史話》，由默片時代，講到五十年代末；此外，在編寫期間，他加盟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當研究組策劃，能接觸到的電影資料，比以前的大幅增多，尤其是五十年代的，所以，他將原先計劃第四卷的五十年代，分為上下兩冊出版。

當余慕雲寫完第五冊後，是我勸他收筆休息，因為香港電影資料館之成立，其工作成績，是有目共睹之十分成功；其次，在資料館有系統的處理下，五十年代以後的電影資料保存，也較早期的齊備完整，加上電腦世界的資訊傳播、流通和保存，不愁電影史料走失的了！還是讓新一代的年輕人接班吧！

不諱言的說，不少人對余慕雲的研究方法有保留，甚或非議和批評。

我卻對余慕雲的研究態度作萬二分的敬重，當日，我對他編寫的這套書，起名為《香港電影史》，他否決地說：「這只是我搜集所得的一些有關香港電影的資料，怎能稱得上是『史』；我寫出來，為供給真正研究香港電影的史學家作參考而已！讓他們考證、分析後，寫的才算是『史』，我這本，叫『史話』吧！」

沒有受過傳統學術訓練的人，單人匹馬、無支援下，面對着足有一百年歷史的浩瀚原始史料，還義無反顧的梳爬整理，為後來者鋪路，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和情操，怎教人不欽佩。

為香港電影史作開荒牛、奠定研究資料的基礎，余慕雲是第一人，毋容置疑！

相信，余慕雲先生仍有很多計劃未曾完成的，例如五十年代以後的電影史話，是其中之一吧！但足夠了，他對香港電影史的貢獻，實在太多了！如今應好好歇息，靜觀因他的努力，所帶給後世的豐裕甜美的成果吧！在此感謝和懷念他。

我知道的 余慕雲特色

石琪



余慕雲與石琪（左一、二）多年來為康文署電影節目籌謀，擔任顧問



（前排左起）石琪、汪海珊、余慕雲、吳昊、劉成漢
（後排左起）李焯桃、黎傑、羅卡、卓伯棠、阮素瑩、李文釗、彭志銘

我和余慕雲認識很久了，每次見面他都很熱情，有講不完的話題，但少談私事。由於不是時時來往，經常「相忘於江湖」，因此我不大清楚他的生平經歷，要看別人的憶述。例如陳柏生在《電影雙周刊》寫〈悼慕雲叔〉（第705期，2006/4/20），就資料豐富，相信香港電影資料館還可進一步提供和搜集他一生事蹟。

當然，每人的一生，都不可能留下全面完整的真實記錄，不少情況連自己也會失憶。涉及很多人、很多代、很多事、又很多影片失傳的香港電影歷史，就更難整理還原，余慕雲在這方面長期努力的貢獻，肯定是他最值得懷念之處。

余慕雲是搜集香港電影史資料的「狂迷」，特別難得是他很早便全憑業餘興趣，自己辛苦訪求，無財無勢無地盤，建立私人資料庫。直至廿多年前，香港國際電影節設立港片回顧研究環節，找到這位「奇人」，他的熱心苦練才有了用武之地，被公認為本地電影的「資料王」。此後他多了發表著述的機會，並成為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開山功臣之一，由業餘研究者變為專業名家。他埋頭數十年，越老越有榮譽。

不必諱言，余慕雲主觀很強，正規學術訓練有限，他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未必嚴格系統化，會有錯漏偏差，還會受強烈的民族感和愛國心影響判斷，受到批評。朋友們亦知道他有時會倚老賣老，辯駁起來火氣長氣，這是他令人覺得可氣又可愛的坦率特色。

其實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客觀，最好是各抒己見，各有角度，互爭互補。有趣的是，余慕雲的民間自發作風，某種程度上也是香港電影發展的特色，至今香港電影業仍然不靠政

府，自由自主，自負盈虧。早期影壇多數人材沒有學院訓練，近十年國際重視的香港武術指導，也往往讀書少，自細在戲班、片場磨練出來。

過去香港式自生自滅、參差不齊的民間特色，無疑也有不少缺點。現在多了學院派和政府資助培訓，本來很好，但為什麼港片反而低迷，港式文化少了活力呢？顯然，民間自發的興趣、創意和熱情始終很重要，如果喪失，便難以在社會轉型中真正反彈。就連研究香港電影，也不能單靠公營的電影資料館，要有更多熱心人參與才好。

余慕雲做的主要是資料工作，尤其是早期港片方面，認為未有條件寫正式香港電影史。至今香港亦未有本地學者用中文全面編寫。今後很需要公私合力，彌補這個遺憾。

還要一提，余慕雲是「老廣東」，對廣東民俗傳統有深厚感情。他熱愛舊粵語片，認為其中保留很多失傳的嶺南民間風俗，以及粵劇不少較古老的藝術程式。他一提起就眉飛色舞，如數家珍，我只能目定口呆。他有很多粵劇資料，尤其擁護粵劇原有的「南派」武打，不滿意一味學「北派」。

近年我遇見余慕雲，就是向他問粵劇多過談電影。但知道他逝世前不久，在座談會討論香港電影始創者問題時，仍然火氣十足。

感激與懷念 痛悼先師 余慕雲

阮紫瑩

師父：

您在4月8日忽然離去了，我們無不震驚和悲痛。

3月31日北帝誕那天，我在佛山祖廟與您不期而遇，異地相逢竟成永訣。

您常開玩笑的對人說：「如果將來我死，一定要即刻死，要死得快，不要痛苦，不要病榻纏綿！」豈料一語成讖，您也心願得償。

連日來我伴着師母為您辦理後事，滿腦子都是空白一片，今天我終於靜下來了，不停地追思、回憶，您的聲音和影像慢慢地在我的腦海再度浮現。

記得認識「余慕雲」這個名字，是因拜讀過您在1981年為第五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刊《香港武俠電影研究》發表的一篇文章〈粵語武俠片的初步研究〉，本是粵語片迷的我，非常敬仰您對電影藝術那般熱忱和瞭如指掌。後來終有幸在某個座談會得見您的廬山，但當時只像小影迷看偶像而已；直至1995年5月我又再遇見您，機會難逢，便硬要與您來個即席詳談。7月30日我再度到您家拜訪，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，第一時間道明來意，謂已辭去文員工作，欲執弟子之禮，專心向您學習，研究香港電影，猶幸您不嫌吾拙，乃得受業，從此追隨左右，孔步亦步，孔趨亦趨。

95年是您最得意和最快樂的時光，既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，又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完成您的心願，為香港電影歷史記下一筆——撰寫《香港電影史話》。我順理成章成為您的助手，記得每天早上八時，我便要到旺角您辦公室附近的食肆等着交功課給您，當時您不斷地向我灌輸電影知識和做人道理。您說：「做學術研究要有興趣、恆心和耐性；要先搜集

資料、整理、分析，總結才是寫書的最後步驟。不要浪費青春、時間、生命，不要與人斤斤計較，不要浪得虛名，不要失禮師父……！」

我知道您惱恨我未加努力寫作，卻終日忙於與電影前輩見面；若我有寫作能力，您便不用替我操

師徒倆



師徒協助籌建佛山黃飛鴻紀念館，與顧問團合照。(前排左起)關漢泉、司徒安、鍾偉明、劉家良、公孫寧、黃飛鴻孫兒黃源德、李燦熾；(後排左起)江少華、陳智華、吳昊、余慕雲、馬雲、阮紫瑩、曾浩祥、鄺佐良、廖昭謙、周蕊嬌。

心。我知道您常為我的前途和生活設想，所以當有人找您工作時，您都盡量轉移給我。我還記得當我的兩篇處女作〈青春歌舞片的搖籃——志聯影業公司〉與〈仙鶴港聯和粵語新派武俠片〉在96年的第二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刊《六十年代粵片新星》內發表後，您竟然高興得急不及待在深夜致電告訴我：「妳寫的兩篇文章已被刊登出來了！」您比我自己更雀躍興奮，使我非常感動，而且終身難忘。您認為「嚴師出高徒」，所以您永遠不會當面稱讚我，反而經常在別人面前訓示我。我是非常明白您「恨鐵不成鋼」的苦心。

師父！您一輩子做研究，堅強又有毅力，從不驕傲自滿，孜孜不倦，不眠不休，一絲不苟，只望耕耘，不望收穫的精神最令人欽敬。您幾生修來娶了師母，她對您忍耐、包容，給您無限支持和鼓勵，她是世上最偉大的妻子，您是世上最幸福的丈夫。

今後在電影資料館再也聽不到您談笑風生，看不到您發現寶物時興奮得手舞足蹈的樣子，再得不到您的循循善誘和勉勵。

春風雨露，澤潤至深，感激您十一年來對我的栽培和教誨。

師父！安息吧！

弟子

阮紫瑩 泣輓

2006年4月29日

余慕雲 永不停下的 巨人

周荔嬌



阿爺與阿周小姐

和慕雲叔的緣份始於1995年。

一個初秋的早上，我到香港電影資料館上班，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慕雲叔。我在報上知道有這位前輩，是一位在電影界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卻怎也沒想到他就是我的老闆！

我當下非常徬徨，想到自己剛從電影系畢業，卻對香港電影歷史幾乎一無所知，對着這麼一位「猛人」，工作起來，必定是捱罵的多。

這種無助的感覺不久便消除了。因為我發現，慕雲叔是位非常仁慈的長者，在工作上處處提點我，而且對我的膚淺問題也會耐心解釋，諄諄善誘。

我愛暱稱慕雲叔為「阿爺」，而他則會老式地叫館內的女同事為「小姐」。所以我們有廖小姐（廖昭薰小姐）、唐小姐（唐詠詩小姐），但不知怎地，我卻是「阿周小姐」（亞洲小姐），因此，不用選美，我就有了一個令人艷羨的「名銜」。



（前排左起）余慕雲、林覺聲、馬啟濃、袁立勳、資料館前任館長廖昭薰；（後排左起）周荔嬌、杜婉霞、王漢華、邵寶珠、資料館現任館長唐詠詩。攝於1996年。

回想起我們還在位於尖沙咀的籌劃辦事處上班的時候，一天早上，我在柯士甸道步行途中，看見前面的阿爺在邊行邊看書，他可以說是一目十行，不消半分鐘便揭一頁，真的神奇！他是那麼討厭浪費時間，分秒必爭的吸收知識。而在校對厚厚的一本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的時候，他往往能全神貫注，拿着小小的放大鏡，不用一個下午便能一口讀完，點出錯處，閱讀的速度快得驚人。

阿爺也有攝影機一般的記憶。每當我們為出版的書刊或展覽選劇照時，他都可以從一套照片中選出最能代表該片的劇照，而且認得演出的人物，由大明星至小配角也「熟如醬油」。他告訴我，每當看資料至枯燥疲憊時，都有一套解悶兼增進記憶的方法，那便是玩「撲克」。詳細的玩法我不清楚，他說那樣能使腦袋放鬆又集中，是預防「老人痴呆症」的良方。

阿爺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都像架衝鋒車，永不停下。他的體力充沛，聲如洪鐘，我跟着他工作，也要上足電，裝上摩打手，才能盡量配合。可這也是訓練我的耐性和速度的好方法，慢條斯理是他所不能容忍的。

他常於省港兩邊走，近年為廣州粵劇界提供資料、擔任顧問，更是退而不休，忙得不可開交。但是他越忙越開心、越起勁。想起吳楚帆說，老人無事做在公園「看雀仔XX」最慘，閒愁最苦，他就不願停下來。

阿爺有時候又像個大細路，尤其在發現寶貴和罕見的電影資料時，雙眼會發出精光，大嘆：「嘩，嘩，嘩，真係正到唔正呀！」像小孩子見到心愛的玩具般，愛不釋手。

慕雲叔在研究界的名字響噹噹，常有人向他請教、找資料，認識或不認識的，他都不會吝嗇，慷慨借出私人珍藏。他這無私的精神最令我敬佩，只要是有意義、對香港電影有建樹的事情他都會做。他常說：「阿周小姐，我都好想教你，但係咁多嘢，我都唔知從邊度開始講，唯有遇到甚麼便教你甚麼。」所以紫瑩（他的徒兒）非常羨慕我，說我每天對着慕雲叔，「近水樓台」，碰到問題都有人指教，不用走冤枉路。

我知道阿爺很疼我。他退休後，每次我們見面大家都非常高興，他笑得眯起的眼睛滿有感染力，見到他笑我心裏也很寬慰。

他一生極少結領帶，除了自己結婚和出席重要場合領獎之外，另一次就在我結婚的時候。那天，他穿着整齊西服，可能是因為不慣，忘了領帶，竟回屯門的家拿了再趕往註冊處！我心裏很是感動，我想，他待我也如半個女兒，看見我開心他也開心。

四月初的某天，我心血來潮，想給阿爺寄上一張問候咭，附上兩個小兒的照片，讓他高興一下。話未說完，幾天後便傳來他猝逝的噩耗。我很後悔，為甚麼要讓瑣事耽擱，不坐言起行呢？

那天早上，我接到同事的電話，不懂反應，腦裏一片空白。阿爺，我們同一天進資料館，又同一天離開，算是有緣。你在電影界名垂青史，前無古人，後也難有來者，能和你共事過，我與有榮焉！人的一生成專心一意地去堅持自己的理想，有賢妻支持，兼做着自已喜歡的事，是何等的幸福！

阿爺，你說過，永不停下，至死方休，你做到了；你說過，不怕死，最怕病，最想瀟灑的去，無痛苦，你也做到了。

你安心走吧！也許有一天，我們再相遇，可以「咁住上」，重溫光與影裏的璀璨美夢。

策劃



歡聚



余慕雲的電影史研究明燈關文清(右五)，告訴他許許多多香港早期電影史跡；並與(左一至三)黎萱、劉芳、童月娟、(右四)關德興、(右一、二)劉歡頤、馮琳相聚電影節。

與小思(左二)相識於創報紙電影廣告做片目之時；(右一至三)施潔玲、鄭杏、張敬慧。

佛山粵劇博物館(現名廣東粵劇博物館)開幕，由冉建國(右一)頒贈牌匾致謝。



與佛山市博物館友好，(左起)劉少梅、李小菁、黃虹、余慕雲、崔禮兵、館長王暉、程宜、科長鄧光民、肖海明。

與胡鵬(中)、張鑫炎



與白沉



余氏夫婦與(右一、二)
小燕飛、馮寶賢



與程季華

與李鐵



與龍剛



香港電影資料館
開幕了。(左起)
余慕蓮、余慕
雲、林蛟、曹達
華。

與蕭芳芳(中)、邱良



與芳艷芬(中)、阮紫瑩





香港電影的研究工作很有意義，可是非常痛苦。我以前多年來只靠自己，付出的多收穫極少，而且非常枯燥苦悶，但我從沒想過放棄。我覺得沒有香港電影史，中國電影史就不完整，很多前人做下的功勳沒有人紀錄。研究香港電影這工作非常有意義，這是支持我至死不變的原因。